

教育的可能

李庆明◎著

著名教育专家
语文特级教师

全国推动读书十大人物
具全国性影响力的中学校长。
独创的师范教育课程体系
获教育部评估组最高评价，
向全国推广



漓江出版社

李庆明◎著

教育的可能

漓江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育的可能/李庆明 著. —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2

ISBN 978-7-5407-6664-1

I. ①教… II. ①李… III. ①教育—随笔—中国—文集 IV. ①G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01039 号

组 稿:曹雪峰

责任编辑:吕解颐 刘 鑫

封面设计:星 星

出版人: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087201-833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650mm×960mm 1/16

印张:14 字数:180 千字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7.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888)

追寻教育中国梦(代序)

李庆明

最近有两个词语在官方和民间几乎同时走红,一是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在最近出版的《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中提出的“重启改革”,一是中共新一届领导人走马上任后提出的“中国梦”。“中国梦”的实现必得“重启改革”,二者的关系不言而喻,教育亦复如是。“文革”后教育改革磕磕碰碰,经历艰辛,但诸多根本性的问题如教育公平问题、德育转型问题、应试教育问题、教育行政化问题、教育家办学问题……似乎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有的甚至愈演愈烈,而曾经的教育梦想却在不断褪色,没有信仰,没有理想,急功近利,自欺欺人,成为当下教育的普遍病症。中国教育,借用吴敬琏先生的话讲,“再度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

教育,需要重启改革,需要追寻五彩缤纷的教育中国梦!

之一:呼唤新启蒙

启蒙是教育的根本使命。康德关于“启蒙”的说法被认为是最权威的,启蒙就是人类从他加诸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中摆脱出来,就是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①理性能帮助我们走出蒙昧或愚昧的幽暗洞穴,似乎是确凿无疑的。但孩子们断文识字,知书达理,获得许多科学的知识、智能、技术、规范等理性经验,学习、生活乃至成人后的工作讲究效率,业绩显

^① 《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

赫,所有这些,能保证他们彻底摆脱愚昧吗?唯唯,否否。理性(特别是科学)曾是刺死上帝信仰的一把利刃,但它也曾是纳粹用来研究杀人的武器;如果我们把理性看得无所不能,不是反而把理性“宗教化”、“意识形态化”,结果又陷入了另一种意义上的迷信或愚昧吗?歌德在《浮士德》里直指“理性一再成为胡闹,欣慰一再成为烦恼”,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再说,理性能开启蒙昧,难道感性、情感就不能?以赛亚·伯林早就提醒我们,浪漫主义追求的个人情感、自由、幸福等等,也是启蒙的一部分,以理性启蒙为己任的康德认为避苦趋乐追求感性快乐的幸福是人的动物属性,因人而异,缺乏普遍性,所以教育应当以培育理性为使命。但他也不得不承认:“所有期望都指向幸福。”^①还有,理性启蒙明显地有一个渐渐世俗化、工具化的进程,科学变成技术,技术变成产品,产品变成财富,而且其间的转化周期越来越短,速率越来越高,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效率、效益、效能成为整个现代化社会的“普世价值”,横决天下,传统社会信奉的生存价值、意义、悲天悯人、田园牧歌、诗意栖居、高贵旨趣、形而上追求、终极关切等等,与现代渐行渐远,但所有这些却是理性无法拒斥得了的,人类世界永远有理性不能企及的领域。哈佛大学的校徽,在哈佛铜像的左面,上面有三本书,其中两本是打开的,有一本却是合上的,它给世人的启示是:有一些智慧永远不能从理性知识中获得。启蒙(enlightenment)原是一种光芒的“照耀”,让人们走向光亮,但诚如一位哲人所言,在绝对的光明中,就像在绝对的黑暗中一样,是什么也看不见的。把理性、现代性绝对化,反而给蒙昧卷土重来以可乘之机。

所以,哈贝马斯说“启蒙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具有深刻的启示性。我们需要理性的启蒙,也需要一种更完备的新启蒙。新启蒙是五四启蒙的延续,又是它的发展,它不再单纯是理性的运用,而是要把理性与情感、肉身与灵魂、知识与信仰、现代和传统、科学与人文等等进行更融洽、更契合的设计和处置,以避免过分理性化、现代化带来人类生存的巨大危机,

① 《纯粹理性批判》。

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它是一种古典精神(包括古希腊和中国先秦文化缔造的古典精神)的回归、转换与重建,只有这样,现代化(包括教育的现代化)才不会失去它的根底,民族文化乃至人类文化的“复兴”才有机会和可能。

之二:缔造儿童的世纪

上个世纪初,被称为瑞典“智慧女神”的爱伦·凯曾出版《儿童的世纪》,期盼20世纪成为“儿童的世纪”。20世纪对于儿童的关注当然是空前的,儿童权益保护、儿童科学发展、儿童文学繁荣、儿童教育运动等等,可谓业绩昭彰。但放眼世界,说20世纪就是儿童的世纪未免过于乐观,解放儿童的任务远未完成,21世纪仍得继续努力。

在我国,还有难以计数的孤儿、残疾儿童、艾滋儿童、流浪儿童、留守儿童、失学儿童、遭受家庭暴力和受拐卖的儿童。毒奶粉事件、疫苗乱相、血铅中毒、童工问题、儿童性早熟、三聚氰胺与“结石宝宝”风波、济宁医院抛弃婴儿事件、校园暴力事件,以及危害更甚的成人文化不设防、无分级,走火入魔的应试教育、工具理性教育,如此等等,让人心如刀绞。

所有这些,折射出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也即“儿童优先”在我国的缺位。“儿童优先”是一个文明国家的道德底线。《儿童权利宣言》(1959年)“序言”庄严承诺:“儿童应受到特别保护,并应通过法律和其他方法而获得各种机会与便利,使其能在健康而正常的状态和自由与尊严的条件下,得到身体、心智、道德、精神和社会等方面的发展。在为此目的而制订法律时,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儿童权利公约》(1989年)“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关于儿童的一切行为,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因此,我们不当再简单停留在“经济优先”和“教育优先”的固有观念之中,无论是国家发展的中国梦还是教育发展的中国梦,都应当植入“儿童优先”的重要价值理念。儿童优先至高无上。就是说,任何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包括教育)的发展,都必须以儿童发展不伤害和儿童利益的最大化为首要前提,否则,这样的发展就应当受到限制,甚至应当让

位给儿童的发展。基于儿童优先战略的教育更应当确立以儿童为本位、为中心、为目的的儿童立场,摆脱任何形式的对儿童的桎梏,摒弃任何形式的对儿童的伤害,尊重、捍卫儿童的尊严和权利,最大限度释放儿童的天性和禀赋,最大可能促进儿童的自由发展和自我实现,让中国的 21 世纪成为名副其实的“儿童世纪”。

之三:为公民中国屹立奠基

改造国民性本是个世纪初(甚至更早)仁人志士们的世纪之梦,它聚焦于一种新型的道德,也即公民道德,不论是龚自珍、魏源的“人心风俗”改造论,康、梁、严、谭的“新民”说,还是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的个性主义的“立人”说等等,都是如此。梁启超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①并称国人“一涉公字,其事立败”。^② 传统中国社会是由血缘和地缘组成的“熟人”社会或一体化社会,既缺少私人空间,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因此无所谓“公民”,只有依附国家的子民、臣民、顺民以及一钱两面的刁民、暴民,在他们身上表现出来更多的难免是“贪鄙之性,褊狭之性,凉薄之性,虚伪之性,谄阿之性,暴弃之性,偷苟之性”(梁启超语)等劣根性。这就是在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失败,经济、政治强国迷梦破碎之后,为什么国民性启蒙与改造被空前凸现的原因,但救亡压倒启蒙,所有这些尝试均付诸阙如,并留下巨大沟壑和断层,如今,公民素质与教养的缺失,诸如“中国式”过马路(包括走楼梯、看电影、打招呼、开会等等),目睹不幸时一旁围观不施援手,发生灾难时趁火打劫坐地起价……总之,道德底线崩溃、独立精神消弭、自由品格萎靡、公共关怀缺席、民粹心理膨胀,依然是民族的巨大心痛。

三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倡导素质教育,却不知缺少公民教育的素质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甚至不能称作真正的“素质教育”。李慎之生前曾发

① 《新民说》。

② 《国民浅训》。

誓下一辈子的最大志愿“是当一辈子的中学公民教员”，这是对今人的一种激励与鞭策。2007年3月16日，温家宝同志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答中外记者问时说过：“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报告中更加旗帜鲜明地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有这些，都为全面深入地推进学校德育转型与变革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公民教育延续上个世纪中断了的国民性启蒙与改造的血脉，是开启教育新时代的伟大召唤，我们还等待什么，顾忌什么？应当旗帜鲜明地开启公民教育的新的世纪之旅！健全公民人格，守护公德伦理，投身公益实践，参与公共事务，认同公理世界，塑造个性丰满、理性平和、民胞物与、胸襟开阔的有担当、有教养、有高贵精神的大国公民，必将为重建中国精神、重铸民族灵魂、复兴中华文明奠定根基。

之四：书香铺就美丽人生

一直致力于倡导设立国家阅读日的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教授曾经说过一段脍炙人口的话：“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一个没有阅读的学校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一个没有阅读的学校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绝非危言耸听。苏霍姆林斯基也说过类似的话：“一种热爱书、尊重书、崇拜书的气氛，乃是学校和教育工作的实质所在。一所学校可能什么都齐全，但如果没有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丰富精神生活而必备的书，或者，如果大家不喜爱书籍，对书籍冷淡，那么，就不能称其为学校。一所学校也可能缺少很多东西，可能在许多方面都很简陋贫乏，但只要有书，有能为我们经常敞开世界之

窗的书,那么,这就足以称得上学校了。”^①我想,如果学校只是引领学生读“教材”,还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学校,也不算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如果学校只是诱使学生沉浸于大量毫无价值的教辅书,更是学校和教育的堕落。叶圣陶说,教材无非是个“例子”,换言之,不过沧海一粟,学校教育的神圣使命是引领孩子书海泛舟,与人类高贵的精神晤谈与对话,唤醒童真,复活经典,重建丰饶而诗意的生命。

高贵的书籍用人类语言特有的卓越方式为我们建立起并呈现出一个超越世俗的永恒的、完美的世界,那是孩子们可以毕生栖居于其中并寻找恒久慰藉的存在家园,这是书籍的不朽魅力。阅读绝不只是为了获得一些有用的知识和技能,而是窥见生命奥秘、通往精神天堂的朝圣之旅。在这个儿童世界被电玩、卡通、电影电视电脑充斥的时代,我们更应当小心翼翼地呵护和牵引他们的阅读,远离灰暗、平庸、虚伪的阅读,远离大众狂欢制造的各种诱人的精神垃圾,将他们放牧在文学的国度,智慧的殿堂,向他们展示这个世界可以变得如何美好、快乐、正义和人道,让所有的知识变得鲜活有趣,让所有的文字变得馨香。这是一种充满诗意、史韵、理趣的高贵阅读。只有心灵复苏、凝聚了这种天堂般的高贵,儿童的精神发育和成长才不会陷入迷茫、空洞和沉沦,才有可能平静地接受理性精神的熏陶,而不沉湎于巫术魔方般神异刺激的诱惑。这样的阅读会使儿童气质斯文,灵魂淳朴,他仿佛沿着雅各的天梯,从尘世的大地拾级而上,走向奥妙无穷的天堂,光亮照彻整个心灵,照亮整个人生,即使忙碌、寂寞甚至贫困,也能展现优雅的气质,并用来滋养家庭风尚,社区文化乃至城市或乡村的精神。

之五:展个性,尚自然

蔡元培在上世纪初就倡导“展个性,尚自然”的教育,以同“守成法”和“求划一”的旧教育相对抗。实现个性解放,是一个未圆的世纪教育

^① 《帕夫雷什中学》。

之梦。

包括教育在内的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孕育于氏族宗法传统的农业社会根基之上,对尊卑长幼等级秩序、氏族群体统一规范高度重视,这种家族本位主义价值观后来又延展为君权至上的国家本位主义,与西方文化建立在早期比较成熟和发达的商品经济和城邦政治基础上的个人本位主义形成显著的文化差异,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指出:“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他精辟地阐述了宗法制度之恶果有四:一是“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二是“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三是“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四是“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东洋民族社会中种种卑劣不法惨酷衰微之象,皆以此四者为之因。”因此,他呼吁“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现代工业文明的迅速发展打破了古老的宗法传统,撕裂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脉脉的血缘纽带,为个性的发展奠定物质基础,但是观念的变易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迅速,加上我们还曾受苏联的一套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一种以扼制自由个性为根本内涵的集体本位主义乃至非理性的国家本位主义观念长期统制学校的教育,它与传统的家族本位主义混杂在一起,对儿童个性发展进而也对民族国家的未来健康发展造成危害,每个教育者都必须直面这一现实!

其实,自由个性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人型。在《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反复强调,理想社会是一个“个性得到自由发展”的社会,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是一个“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如此等等。诚然,个人或者个性并不绝缘和孤立于社会群体或集体之外,他依赖集体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而个体之所以有可能如此依赖集体,是因为这个集体不像过去那种“虚幻的集体”对个体来说只是一种异己的、敌对的力量,所以,个体对集体的依赖不是以泯灭个体的个性为条件,如马克思所言,他不是作为“阶级的个人”,而是作为“个性的个人”生活、发展于这个集体之中的:“个人是作为个人参加的。它是个

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自然是以当时已经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的),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在范围更大的集体中,同样如此,由于生产的极大社会化和全球化,人们形成了无比丰富的社会关系,“各个单独的个人才能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包括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并且可能有力量来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人们所创造的一切)”。于是,“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① 这样的个人注定了是一种具有全面流动性、高度适应性的“海洋型自我”,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个人“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② 因此,我们需要的是建立在崇尚自由多元个性基础之上的集体主义教育,需要的是汲取了全部世界历史文明成果拥有“真正普遍的个人”内涵的爱国主义教育,唯有如此,才能开启梦幻旖旎的少年,五彩缤纷的人生,进而才能缔造和谐公正的集体,民主富强的国家。

之六:减负,把幸福归还儿童

学业负担过重,已经成为我国基础教育的“死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减负战役声势浩大,硝烟弥漫,却收效甚微,应试教育城堡依旧巍然耸立,各级各类英雄仍然笑傲江湖,高负荷境遇下的万千儿童继续上演畸形发展的悲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再一次祭起“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大旗,呼吁从政府,到社会,再到学校,直至家庭,全面出击,合理围剿应试教育,整体推进减负工程,令人鼓舞,催人奋进。不过我觉得,最为紧迫的恐怕还得在治本上痛下“杀手”。何为本?大凡有四:

一曰强化法治。全面实施《儿童权利公约》《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坚决捍卫儿童神圣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享有休息和闲暇,从事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

与儿童年龄相宜的游戏和娱乐活动,以及自由参加文化生活和艺术活动的权利,以及受到保护,以免从事任何可能妨碍或影响他们学习,甚至有害他们身心健康的工作,凡有违背者,不论什么组织、机构和个人,均受到严厉制裁。

一曰改善课程。坚决克服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仍然普遍存在的繁、难、深、僻、假、旧、空、缺、冷、死等顽症,最大限度弱化国家本位、社会本位、成人本位的课程,最大限度开发、丰富适应儿童发展需要、儿童喜闻乐见的课程,消除儿童学习的无谓能量消耗,在此基础上改进教育教学行为,焕发课堂的生命活力,增强学生的学习动力,引导他们用最经济的方式,获得最大的效能,最高的品质。

一曰变革考试。变革考试自变革作业始,小学应当不留任何家庭书面作业,中学应当大幅减少家庭书面作业,并丰富作业形式,为学生留下充裕的闲暇时间,充分休息、娱乐,或从事更高级、更自由的活动,得到更全面的发展。变革考试不仅要减少考试次数,提高考试质量,更要从根本上变革中考、高考体制,中考应当随义务教育年限的延长而逐步弱化乃至取消,代之以更科学的学业成就和综合水平测试,或适合学生自主选择的高中学校自主招生考试。高考尤应当加速釜底抽薪式的变革进程,减少高考对高中课程的依赖和检测,废除高校统一入学考试,以有利于公平选拔的高校招生名额国家统一分配管理制度为依据,以高中学业成就测试和综合素质评价为参照,全面实现高校自主招生。

一曰优化环境。学生减负后拥有的闲暇时间、自由时间应有释放的社会空间。国家应当加速制定社会教育法,明确包括政府、学校、企业、社会组织、媒体乃至每一个人在内的社会教育责任,各级政府加大社会教育的投入,并鼓励民间力量积极参与,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儿童学习、休闲和娱乐的各种社会教育设施,净化社会教育环境,规范社会补习机构,取缔劣质教辅市场,加强校外活动场所管理,为减负增质培育良好的社会环境。

之七:文化立命,走向教育澄明之境

学校是传承文化的天然场所,曾几何时却蜕变为文化荒芜之地,似乎

是危言耸听,却是不争的事实。原来,文化不只是知识,甚至主要不是知识,而是终极目的的信念执著,和扎根大地的智慧生成。前者如康德所言:“唯有那能够作为最终目的(我们从人类方面把它赋予自然界)的东西才是文化。”后者如斯宾格勒所说:“这些生命的精华——文化,正如田野里的野花一样,漫无目的生长着……”二者结合起来,也就是我国古代哲学倡导的那种上天入地孜孜以求的生命之“道”和天地“境界”。循此,学校文化,教育文化,也就是教育者得以安身立命的魂魄或精神家园。没有了这样的魂魄和家园,文化呼声再高,名号再多,也只能暴露文化的贫瘠和苍白。

文化的失落有很深刻的现代背景,现代物质文明的急剧演进缔造了膜拜科学技术的新宗教,导演了充满血腥的新野蛮,尤其带来了空前的人性异化和精神危机,这在根本上便是文化问题。胡塞尔提出科学危机时代命运攸关的“意义问题”,韦伯提出工具理性统制和价值理性失落的问题,福柯提出“人之死”的问题,斯宾格勒提出文化和文明势不两立、缺少了文化内涵的西方文明便是一具“僵尸”的问题,等等,都警示世人:文化危机是人类危机中最可怕的危机,作为从根基上影响人类生活的力量,文化危机有可能导致人类精神世界的坍塌。教育或学校的无文化也大抵如此,形形色色的教育现代化变革虽然创造和提供了令人炫目的新知识、新技术、新工具、新方法和一些似是而非的新观念等,但却没有为教育灌注深刻而恒久的、能令学校世界所有的个人安身立命的文化精神,反将师生带入一个他们备感陌生、抽象、片面和异己的地带,这就是“学校无文化”的窘态!因此,呼唤文化立根,实乃当代教育生死攸关的急迫课题。

文化具有许多别样的特质。文化是鲜活的,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文化是象征的,是一套表意象征的系统,世代沿袭的密码;文化是柔软的,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强大的“软实力”;文化是积淀的,是长期积累的内生性历史性产物;文化是濡染的,对一个组织或人群的作用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文化是绵延的,一旦形成,就会产生恒久而深厚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学校文化建设不可一蹴而就,而需要坚持不懈地漫长修为与经营。如

果把学校比作生命的舞台,文化对于每个教育者而言,就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说的那样,是“给自己的心灵‘化妆’和‘穿衣服’”。在这个充满活力的舞台上,学校的建筑与环境是教育的“道具”与“布景”,表现与众不同的独特韵味和风格;校歌、校训、典礼、仪式、故事与传说等,组成丰富的语汇或符号,隐喻教育哲理,氤氲教育史韵;而教师则是理所当然的主角,且歌且行,咏唱永恒的教育主题,上演教育的“灵之舞”,发扬蹈厉,气贯长虹,使人继其声,续其志,薪火相传,不绝如缕,这才是教育的无穷魅力所在!

之八:有教无类,促进教育公平

“有教无类”是一个古老的教育梦,无论是中国先秦的孔子还是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早就提出过类似的教育理想。尽管古老的公平观更多是一种原始的平均主义,但它仍然是当下社会发展的一个价值范本。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曾赞美这种原始平等的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并在本书的结尾曾耐人寻味地引用了摩尔根的一段话:“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多的阶段,……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的确,社会经济的急剧发展导致的社会不公,包括教育不公愈演愈烈,使这一古老的教育公平观具有了崭新的时代意义,没有什么时候像今天那样更需要在一个新的阶梯上“复活”这种古老的教育公平制度了。

教育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基石。受教育权是一种基本的人权,追求教育均衡与公平,使每个社会成员都机会均等地享有受教育的权利,是文明社会的基本尺度,也是社会平等与公正的必要条件。美国总统杰斐逊曾说:衡量教育是否造福于社会,主要不是看它造就了多少杰出人物,而是看它有没有使大多数人能够享受到必要的教育。这就是现代教育公平的理念。进一步加大国家和各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尤其是贫困地区教育的倾斜性投入,完善从学校到社区的公共教育设施;延长免费教育年限,推进教育终身化;增加优秀教师的区域流动,大幅提升教师

尤其是贫困地区教师薪酬;学校教育应当倡导和恪守“不让一个孩子受到歧视,不让一个孩子中途掉队,不让一个学生失去最佳发展机会”的教育平权理念和原则,确保每个学生的全面发展、均衡发展和多元发展。

之九:乐于英才,走向卓越

当然,捍卫教育公平不等于疏远和抛弃精英教育。国外英才教育历史悠久,如英国的公学教育,美国的“常春藤联盟”,都举世闻名。《为精英主义辩护》的作者威廉·亨利曾说:“我们中间有的人比其他人更出色,也就是说,更聪明,更勤奋,更博学,更能干,更难以取代。一些思想比其他思想更深刻;一些价值观念比其他价值观念更有生命力;一些艺术作品更具有普遍价值;一些文化比其他文化更灿烂,因而更值得学习……”这就是精英教育的基础。

不可否认,精英曾在历史上的社会变革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著名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思想启蒙”、“工业革命”、“光荣革命”、“明治维新”、“戊戌变法”、“五四运动”,都闪烁着精英群体与个人高贵精神、卓越气质和非凡智慧的光辉。在一个趋向民主和平等的公民社会里,精英主义和平民主义并非水火不容。民主不等于消灭标准,平等不等于否认差异。什么是精英主义?威廉·亨利认为,就是在各行各业提倡“向高标准看齐”。这样的精英主义已经不同于传统的精英主义。传统的精英主义导致专制、垄断和不公,它高耸悬崖,设下暗礁,堆垒条块,划分畛域,阻断了平等交流和自由生活,与时代潮流相抵牾。在平民主义时代,精英和平民是可以并行不悖,双择互动的。美国的精英教育在这方面值得借鉴。美国教育从学前班开始就灌输精英理念,人们到处可以听到“领袖才能”这类字眼。但想要当领袖,首先要打破传统精英“理所当然的权利”,学会谦卑,体贴他人,艰苦奋斗,取信于人,孩子稍大一些的时候,家长们把他们送到国内外的贫困地区做义工。通过义工的服务,子女了解社会,了解底层,建立和被领导的人沟通的纽带,发展自己的领袖才能。这显然是一种渗透着平民主义理念的精英教育。

因此,建立一种国民素质教育和精英启蒙教育并行互通的新教育模

式,是有必要的。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尤其不能忽视精英教育战略。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水平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要实现赶超,就必须在实施国民素质教育的同时有条不紊地推进精英教育。《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尊重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培养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实际上就包含了这样的沿着国民素质教育和精英教育拾级而上的价值取向。实施精英教育,要以培育德性高尚、情趣高雅、智慧高卓和气质高贵的未来社会栋梁为目标,为禀赋优异的学子提供更加精致化、个性化的教育教学,使之在各自的领域展示卓越的才能和品质。

之十:教育家归来

中国是一个曾经诞生过无数伟大教育家的国度。每个时代的每个教育家就是一部传奇,一座丰碑,一个时代,他们有如擎天巨柱,撑出各个时代教育的灿烂星空。有人说,没有真教育家,教育就是失败的教育。当今的中国教育呼唤教育家归来,呼唤教育家办学!

在《教育家什么模样——李吉林的启示》一文中,我曾经从四个方面概括教育家的形象:第一,对于儿童和教育具有一种神圣的情怀;第二,陈腐教育的勇敢批判者和“我行我素”的坚定探索者;第三,发出彰显时代精神乃至世界意义的“中国声音”;第四,田野式的扎根研究铺就通往教育家的“美的历程”。^① 在另一篇理想教师角色期待的《教师八喻》中,我把理想的教师比作有神圣信念的“知更鸟”、有知识分子人格的“特立独行的猪”、有创新灵性的“海豚”、有思想者气质的“猫头鹰”、有学术积累的“狐狸与刺猬”、有艺术修养的“云雀”和有实践智慧的“蚂蚁”^②如果教师把这八种动物的品质修炼到很高的境界,也就差不多具备教育家的条件了。

① 《教育研究与评论》,2010年第2期。

② 《教育研究与评论》,2011年第4期。

不过,我始终认为,教育家作为心灵的伟大导师,作为教师的伟大代表,作为时代的伟大良知,毕竟是凤毛麟角的。诚如施特劳斯所说:“正如土壤需要它的培育者,心灵需要老师。但老师的产生可没有农夫那么容易,老师自己是学生且必须是学生。但这种返回不能无限进行下去:最终必须有一些不再作为学生的老师。那些不再是学生的老师是伟大的心灵,或者为了避免在如此重要的事情上的含糊其辞,可以说是最伟大的心灵。这些人实乃凤毛麟角。”^①也正因为如此,我对“培养工程”试图培养成群结队的教育家抱有疑虑,我坚信,成就教育家的根本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自由,包括去行政化管理的自由制度安排,支持冲破陈说的自由学术环境,鼓励大胆探索的自由实践条件,以及宽容我行我素的自由个性认同。只有这样,才能期待教育家的诞生,期待中国教育的伟大复兴!

“无端忽作太平梦,放眼昆仑绝顶来。”^②教育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乌托邦的情怀,需要憧憬未来的梦想。梦想会产生神奇的信念和力量,有了这些信念和力量,我们就能从绝望之岭劈出希望之石,并用它铺筑通往美好未来的金光大道。如果中国要成为伟大的国家,中国教育要成就伟大的教育,就必须实现这些梦想!

① 《什么是自由教育》。

②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